

舒安先生史席間

先生曾一至天津正襟奉謁則已歸

慷慨甚得吳君書示

先生不日移居校中玉慰考試今題

戶牖中而推前代正安為國家中者

進行此一句內頗源發不能用心

內學能乞

專教系極正而最難得士後梅君在

本校最久人極忠厚正不才感其未風波

教者自學自先生之化也國學之有相為根柢

二者中任以二者教者其為難矣其為難矣

可貴惟以法可不論或至其更長有可畏

勢振振不虛席代表則謂筆墨不

可何如以此

中国文论与名家典范

古代文学理论研究

第三十六辑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胡晓明 主编

中国文论与名家典范

古代文学理论研究

第三十六卷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胡晓明 主编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古代文学理论研究. 第36辑, 中国文论与名家典范/胡晓明主编. —上海: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3. 7
ISBN 978-7-5675-1061-6

I. ①古… II. ①胡… III. ①文学理论—中国—古代
IV. ①I206.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171429 号

中国文论与名家典范

——古代文学理论研究第三十六辑

主 编 胡晓明
项目编辑 陈庆生
审读编辑 高淑贤
装帧设计 黄惠敏

出版发行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社 址 上海市中山北路 3663 号 邮编 200062
网 址 www.ecnupress.com.cn
电 话 021-60821666 行政传真 021-62572105
客服电话 021-62865537 门市(邮购)电话 021-62869887
地 址 上海市中山北路 3663 号华东师范大学校内先锋路口
网 店 <http://hdsdcbs.tmall.com>

印刷者 常熟高专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90×1240 32 开
印 张 9.75
字 数 267 千字
版 次 2013 年 9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3 年 9 月第 1 次
书 号 ISBN 978-7-5675-1061-6/I·1011
定 价 28.00 元

出 版 人 朱杰人

(如发现本版图书有印订质量问题, 请寄回本社客服中心调换或电话 021-62865537 联系)

编辑部报告

昔高棅以九格品唐诗,具“名家”之目;郭若虚叙图画名意,有“典范”之称。在今天,名家典范往往成为人们可以效法的人或事物的代名词。质诸中国文论,两千多年的发展过程中有太多的经典值得我们去研读,从而提炼出具有独特价值的话语体系;百余年的研究历史中,也有诸多的名家名作堪称典范,足资效仿。在草根文化盛行的当下,品读名家典范,坚持中国文论的正统,守先待后,面对诸如“失语症”之类的指责和古代文论现代转换的诉求,补偏救弊,均有一定的积极意义。

本期的几篇文章明显具有关注名家典范的意味。学术史的回顾梳理,对典范的重温,无疑是学术演进的重要路向。史伟《西学东渐中的观念、方法与民国时期中国文学研究——以人类学的输入为中心》便立足于晚清民国时期西方人类学输入中国后所引发的研究方法 with 观念的更新。由王国维、刘师培和鲁迅运用人类学理论解释文学的起源而归之于祭祀巫觋、神话传说或歌谣,到文学研究和文学史写作中进化论思想的渗透,再到顾颉刚古史辨和民俗研究中人类学方法的运用以及郑振铎和钱南扬的有关研究,从而为我们抉发了西学东渐的大潮中,人类学的输入所带来的观念与方法的创新对历史与文学研究所带来的巨大影响。这无疑是值得我们重新审视的现代学术演进的个案。倪春军《民国时期的词集笺注与词学阐释——以两部〈花间集〉注本为中心》同样以民国学术为观照,只是选取了词集笺注与词学阐释的角度。作者认为,诞生于上世纪三十年代的两种《花间集》注本,李冰若《花间集评注》以“评”胜,作者以“栩庄漫记”名义所撰写的两百多条评语,发前人所未发,提出了许多独到的见解;

华连圃《花间集注》以“注”胜，对词中名物制度详加注释，是当时最丰赡的《花间集》注本。两书之注释体例、阐释方法以及所体现出的注者深邃的学养，足以垂范后世。王逊《作为方法的“文学思想史”》则从罗宗强先生的“文学思想史”研究出发，探讨其文论研究的方法论意义。文学思想史的研究包含三个内涵：从文学创作中提炼文学思想、文学创作倾向与文学思想相印证、士人心态与文学思想相印证。此一方法经过罗宗强先生及其弟子张毅、左东岭等人的实践和阐扬，已为学界所广泛接受。这显然也是古代文论研究中具有典范意义的创获。刘炜《论马一浮的诗歌批评标准》围绕马一浮论诗“第一要胸襟大，第二要魄力厚，第三要格律细，第四要神韵高，四者备，乃足名诗”的观点，一一进行细致阐释，抉发其诗学融和了明清诗学中的“格调说”、“神韵说”和“肌理说”的特质，尤其突出了叶燮对马一浮诗学的影响。进而指出符合马一浮诗学标准的典范是陶渊明和杜甫。曲景毅《“大手笔”作家视域下的唐文演进论》从“大手笔”作家的创作切入，分析唐代骈体文的演进以及骈散之争的问题，并讨论了“唐三变”以及唐文的分期。亦是立足于名家的角度来立论。潘中华、杨年丰《〈钱载批点翁方纲诗〉整理》虽然是一篇文献辑录，但从钱载于翁方纲使粤诗稿本上所作批语，可以看出钱载在探讨诗律、诗格、诗法上的努力以及将金针度与人的气度，诸批语对钱载论诗旨趣及翁方纲肌理说的探讨也有重要的文献价值。如今钱载之《箨石斋诗文集》已出版，如能将其他诸书中的批语汇集，几者结合应该可以做出一篇很好的关于钱载诗论的文章。这是可以期待的。

对文学理论与思想的研究，仍是本辑的重要内容。日本神户女子大学林田慎之助教授《钟嵘的文学理念》发表于1978年九州大学的《中国文学论集》，迟至今日始由独孤婵觉翻译过来，不过仍有其参考价值。文章梳理了钟嵘作《诗品》的历史背景，即品评优劣之风的流行以及诗坛“伤其真美”的弊病。该文重点讨论了钟嵘对雅怨清奇诗风的推崇和对平俗诗风的批评，最终落脚在钟嵘对曹植“情兼雅怨，体被文质”的肯定，认为曹植是体现钟嵘文学理念和美学意识的

典型。杨传庆《试论清季浙西、常州词派词学思想的融合——以“清空寄托”为例》，讨论清季词坛名家郑文焯的词学思想，认为其将浙西词派之“清空”与常州词派之“寄托”融合成了“清空寄托”之说，是为当时词坛的弊病开出的一剂良方。在郑文焯看来，词之意重寄托，词之体尚清空，二者结合才是完美之词。“清空寄托”的内涵就是寓寄托于清空之中。显示了清季浙、常两派词学思想的融合。李璞《复古与养气——论刘将孙对刘辰翁文学思想的继承与发展》认为刘将孙的复古主张是强调“文道合一”与“辞达”，这对乃父刘辰翁的思想更多的是继承；而其养气说强调“中和”之气，则对刘辰翁之激越哀怨有所扬弃。作者进而认为，刘将孙的文学主张，折射出宋末元初，社会由乱离走向太平，加之科举恢复后，江南士人心态的变化，以及文学创作由奇变复归雅正的发展趋势。王奎光《论方回〈瀛奎律髓〉中的张籍诗评》认为，方回通过《瀛奎律髓》对张籍律诗的选评，细致地揭示出张籍五律所具有的独特的思想价值、艺术风格，以及体现其风格之具体艺术技法，以及其对唐宋五律发展所产生的积极影响，打破了唐宋以来人们只重张籍乐府而轻其律诗的偏见。这对我们重新评价张籍有参考意义，也有助于加深对方回唐宋律诗学的理论及其批评体系的建构的认识。

昔谢安九世孙谢贞《春日闲居》有“风定花犹落”之句，似乎预示着王谢家族之衰败无法挽回；而俞曲园以“花落春犹在”得曾文正之激赏，又蕴蓄着那一片衰飒中的不绝如缕的生机。落花，往往成为家族、国族命运的象征，常常为诗人所吟咏。人们又常说“世事如棋局局新”，身处衰世则如残棋般不可收拾。张煜《落花与残棋与儒释互济——陈宝琛与佛教》从落花与残棋的意象切入，讨论了清季诗人陈宝琛哀清亡、悲身世之作，并由此抉发其儒家忠君与佛教空幻思想兼融的特点。面对清王朝的“无可奈何花落去”，其时之逊清遗老既关心国事，忠于旧朝，而又欲从佛法中寻求心灵解脱，这是时代的共相。陈宝琛诗中的花果飘零与乱棋满局，只是较为突出的个案而已。

此辑编成，正值风力达到十七级的超级台风“苏力”掠过上海。大风呼号了三四天，虽然没有带来降雨，却吹走了灰霾与乌云，上海又重现久违的蓝天白云。此际捧读诸文，不觉心情为之一畅！

目 录

编辑部报告	(1)
-------------	-------

◆ 通 论 ◆

西学东渐中的观念、方法与民国时期中国文学研究

——以人类学的输入为中心	史 伟(1)
作为方法的“文学思想史”	王 逊(28)
并置结构:比兴的基础	
——以《周易》卦爻辞为例	王 莹(42)
儒家音乐美学的一隅观照	
——孔颖达音乐美学思想论	常 清 乔东义(62)

◆ 文 ◆

论南北朝的“谢启”:以赐物谢启为观察中心	陈恬仪(74)
“大手笔”作家视域下的唐文演进论	曲景毅(100)
复古与养气	
——论刘将孙对刘辰翁文学思想的继承与发展 ...	李 璞(114)

◆ 词 ◆

试论清季浙西、常州词派词学思想的融合

——以“清空寄托”为例	杨传庆(131)
龚自珍与灵箫关系及其对龚氏晚年精神世界的	
影响	杨柏岭(146)

民国时期的词集笺注与词学阐释

- 以两部《花间集》注本为中心 倪春军(167)

◆ 曲 ◆

“欢喜心”与“游戏笔”

- 李渔喜剧主义文学创作观论略 钟明奇(185)

◆ 诗 ◆

钟嵘的文学理念 (日本)林田慎之助 独孤婵觉 译(199)

论方回《瀛奎律髓》中的张籍诗评 王奎光(220)

落花与残棋与儒释互济

- 陈宝琛与佛教 张 煜(233)

论马一浮的诗歌批评标准 刘 炜(244)

◆ 文 献 ◆

《钱载批点翁方纲诗》整理 潘中华 杨年丰(264)

西学东渐中的观念、方法与 民国时期中国文学研究

——以人类学的输入为中心

史 伟

“西学东渐”是近现代学术研究的核心要义，也是文学研究的核心要义。对此，学者很早就给予了巨大的关注，王国维、陈寅恪等都有过很好的论述。早在 20 世纪 80 年代，王瑶先生就曾指出：“从中国文学研究的状况说，近代学者由于引进和吸收了外国的学术思想、文学观念、治学方法，大大推动了研究工作的现代化进程。……从王国维、梁启超，直至胡适、陈寅恪、鲁迅以至钱锺书先生，近代在研究工作方面有创新和开辟局面的大学者，都是从不同方面、不同程度地引进和汲取了外国的文学观念和文学方法的。”^①但是，中国先进的学者究竟在西学东渐中具体地受到怎样的方法论的影响，使得传统的中国古典文学研究得以别开生面，从而开启了文学研究现代化的进程，这些问题至今没有得到明晰的解答。

近现代文学学术史研究，随着 20 世纪 90 年代近现代学术史资料大量整理出版，取得了积极的和深入的进展，但是就文学学术史研究自身而言，多是专人、专门文体或综述性的研究，方法论方面的探讨仍然是零星的和不自觉、不充分的，这势必导致一些重要的学术问

^① 转引自王瑶主编《中国文学研究现代化进程》陈平原《小引》第 2 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 年版。

题难于得到很好的解释和解决。^①同时,目前的学术史研究多局限于文学本身,缺乏跨学科的、综合的和通贯的研究,因此也未能深入到其时学术研究的理路,从而也不能更好地、更切实地对民国文学研究进行描述和评价,而民国时期各学科、领域之间的影响既非常活跃,具体到学者个体,也多具备跨学科的知识能力,而有多方面的成就。

晚清暨民国,是世界近现代各种思想学说涌现,在中国或多或少发生不同影响的时代。总体来讲,除了与中国传统的“知人论世”有着内在关联的社会历史的研究方法之外,为文学研究提供了最基本的观念、工具和方法的是西方18世纪以来,特别是19世纪后期至20世纪初期形成的两种重要的基础性学科,一是人类学,以及与人类学密切相关的社会学、民俗学、神话学等学科;一是现代语言学(特别是语义学研究)及与之密切相关的新批评等文学批评理论。本文即欲对前者影响于文学研究的情况作一梳理,语言学(语义学)的方面当另文论之。

一、人类学的输入

人类学是萌芽于18世纪欧洲启蒙运动,形成于19世纪后期、20世纪初期的一门基础性学科。广义的人类学包括人类学的两大分支——体质人类学和文化人类学,狭义的人类学仅指文化人类学。^②这里取后者,并兼及与之密切相关的社会学、民俗学、神话学等,而在民国时期,人类学、社会学、民族学在学界的分界本颇多融通之处。^③

洋务运动后,中国知识界向西方除了器物制造方面的学习外,也

① 目前所见的比较系统的清、民之际的学术史论述,仅有钟敬文《晚清革命派著作家的民间文艺学》(《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63年第二期)。钟敬文早年深受顾颉刚“古史辨”的影响,亲历民国学术史的变迁,其所论述极具卓识,其《五四前后的歌谣学运动》、《作为民间文艺学者的鲁迅》(二文俱收入《钟敬文民间文艺学文选》,安徽教育出版社,2010年版。)等也可参看。

② 胡鸿宝主编《中国人类学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30—34页。

③ 参见费孝通《个人·群体·社会》,载《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4年第一期。

开始制度、文化方面的输入,人类学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零星地输入进来。^① 严复最早系统地译介了西方社会科学著作,他同时也带来了人类学的知识,因为18世纪后,西方学者进行现代社会研究的时候,已经开始尽力追溯至史前文明,同时运用古文献、传教士记载和逐步积累的考古、田野考察的知识进行文化形态比较的研究。斯宾塞固然是把英国人类学引向功能主义分析的重要学者,严复所翻译的孟德斯鸠《法意》(今译《法的精神》)也是法国人类学的奠基性著作,甄克思《社会通论》则已涉及到宗法、图腾理论。稍晚,对于晚近中国学术有着重大影响的梁启超、章太炎、刘师培等在社会学、人类学的传播中,也都起到了导夫先路的作用。梅光迪曾对这个时期中国学界有集中的论述:“吾国最初以西洋学术号于众者,大抵速成之流东学生,与夫亡命之徒。前者急不能待,后者奔走于立宪或革命运动,无暇入彼邦高等以上学校,执弟子礼于名师之门,故于学术中各家之原原本本长短得失,皆凭其未受训练之眼光以为观察,而又以唤醒国人,刻不容缓,加之国人程度低下,无需高深,故彼等一知半解之学,亦聊胜于无。犹饥者易为食,渴者易为饮也。”^②这段文字于晚近中国学习西方学术的情状梳理得非常清楚,其中“速成之流东学生”概指鲁迅、周作人、钱玄同诸人,“奔走于立宪或革命运动”的“亡命之徒”概指梁启超、章太炎、刘师培诸人,这些人“于(西方)学术中各家之原原本本长短得失”确有了解未彻的地方。梅光迪作为白璧德的入室弟子,其批评不能说未中肯綮,但现在看来,“速成之流东学生,与夫亡命之徒”中的优秀分子,由于其深厚的旧学根柢,由于他们于中国传统弊端所见之深切,其于西方学术的深心独造之处,实也为梅氏所无法揣度。

① 谭嗣同《仁学》最早采用了“社会学”一词,维新派康有为《大同书》中“群学”即社会学,这个名称在早期中国的翻译著作中一直沿用。参见孙本文《当代中国社会学》,商务印书馆,2011年版,第9—10页。

② 见梅光迪《论今日吾国学术界之需要》,原载《学衡》,1922年第四期,收入《梅光迪文存》,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144—145页。

此后,主要通过翻译、海外留学(早期的主要是赴日留学,事实上很多欧洲学术经典就是通过日文转译过来的^①),人类学的知识也随着涂尔干、泰勒、安特路朗(也有的译作安特路阑、安德留·兰等)、弗雷泽等学说的介绍进入中国。从当时学者接触的文献来看,虽然不尽系统,涉及却颇广泛,例如周作人多次提及的英国哈特兰(G. L. Hartland,周作人译为哈忒阑)的著作,至今仍没有译介过来。王国维在《论近年之学术界》中说:

唯近七八年前侯官严氏(复)所译之赫胥黎《天演论》(赫氏原书名为《进化论与伦理学》,译义不全)出,一新世人之耳目,比之佛典,其殆掇摩腾之《四十二章经》乎?嗣是之后,达尔文、斯宾塞之名腾于众人之口;物竞天择之语,见于通俗之文。顾严氏所奉者,英吉利之功利论及进化论之哲学耳,其兴味之所存,不存于纯粹哲学,而存于哲学之各分科,如经济、社会学等,其所最好也。故严氏之学风,非哲学的,而宁科学的也,此其所以不能感动吾国之思想界者也。近三四年,法国十八世纪之自然主义,由日本之介绍,而入于中国,一时学海波涛沸渭矣。^②

所描述的就是清、民之际,救亡图存的时代刺激下,社会学包括人类学被大规模引进的情形。所谓“顾严氏所奉者,英吉利之功利论及进化论之哲学耳”,也是正确的概括,与此相关联,就文学以及神话学、民俗学研究而言,对中国学界,仍以英国泰勒、弗雷泽的人类学进化学派之影响为大。19世纪中后期英国社会学者多秉持与达尔文一致的进化论的观念,相信当前的文明一定是经原始的史前文明的阶段进化而来,“与他们不同的民族一定生活在某种我们的祖先经历过的原始状态中”,“所以,发现人性的一个重要途径,就是去研究被认

① 参见[日]实藤惠秀著,谭汝谦、林启彦译《中国人留学日本史》第五章《留学日本的翻译活动》,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

② 王国维在《论近年之学术界》,载《中国现代美学名家文丛·王国维卷》,浙江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8—9页。

为是原始社会的异文化,这就促使了 19 世纪中叶社会人类学的诞生。”^①而早期的中国学者也由此受到了人类学的基本训练。这个时期西方人类学的特点,如注重宏观而不是注重微观;注重规律性和一致性的探索而不是特殊事件的探索;注重民俗、神话传说研究,并以此进一步进行文化考察,而不是社会结构的考察;特别是注重文明起源的研究。这些特点,且不论其优劣得失,在中国学者的相关研究中都可以得到不同程度的体现。

1903 年,人类学被列入大学课程,西学东渐的成果以学科设置和课程设置的方式肯定下来。^②王国维在《〈奏定经学科大学文学科大学章程〉书后》中说:“由余之意,则可合经学科大学于文学科大学中,而定文学科大学为五:一、经学科;二、理学科;三、史学科;四、中国文学科;五、外国文学科。”^③其中“经学科科目”设置心理学、社会学,“理学科科目”设置心理学、社会学,“史学科科目”设置比较言语学、比较神话学、社会学、人类学,“中国文学科科目”设置心理学。这段话可以体现王氏于社会学、人类学的理解,尤其是对于社会学、人类学在人文社会科学诸学科中的基础性位置,有着精深的见解。至于除“史学科科目”外均设置了中西哲学史或者哲学概论、历史哲学的科目,则反映了王氏一直以来对于哲学的重视。

到 20 年代,对我国社会学、人类学有着深远影响的一批专业学者如吴文藻、孙本文、潘光旦、吴景超、杨开道等出国留学,并于 20 年代末或 30 年代初学成回国。^④同时稍早,受到人类学、宗教学专门训

① 引文参见[英]爱德华·埃文思-普里查德著、冷风彩译《论社会人类学》(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10 年版)。梁永佳所作“代译序”第 5 页。相关论述可以参见爱德华·埃文思-普里查德《论社会人类学》第一讲“社会人类学:历史与现状”部分,第 99—112 页。

② 参见孙本文《当代中国社会学》第二章《中国社会学的萌芽》第三节《社会学课程的设置》。

③ 王国维《〈奏定经学科大学文学科大学章程〉书后》,原刊 1906 年《教育世界》杂志,收入《中国现代美学名家文丛·王国维卷》,浙江大学出版社,2009 年版,第 95 页。

④ 参见孟航《中国民族学社会学人类学史(1900—1949)》,人民出版社 2011 年版,第 106—107 页。

练的学者如李宗侗(1924年回国)、江绍原(1923年回国)等已分别参与了顾颉刚的“古史辨”讨论和妙峰山专号的讨论。这些专业社会学家以及他们的学生费孝通、林耀华、李安宅等基本上仅从事社会学的研究,探讨中国社会结构和社会变迁,而无预于文学研究,然而这并不意味着人类学及相关学科对于文学研究影响的削弱(朱自清曾涉猎李安宅的著作,尤其是李安宅“语意学”方面的译著,顾颉刚曾与潘光旦讨论古史中“禹”的问题),而是意味着其时中国学者对于社会学、人类学研究领域、研究方法等方面的学科自觉已经非常清晰。

二、王国维、刘师培、鲁迅等研究中人类学方法的运用与文学起源论

人类学介入文学研究,最初解决的是文学起源问题。中国古代文论中,对于文学起源问题,或者将之归诸古圣先王神道设教,作玄学的解释;或者搜罗古佚,从最早的历史文献记载溯本推源。但是,人类学的知识使得中国学者可以从巫觋祭祀、民谣及神话传说中推求文学之起源。

这一点在中国文学研究现代化进程的开拓者王国维、刘师培、鲁迅等的研究中可以清楚地体现出来。如所周知,王国维是通过日人藤田丰八和田冈佐治开始接触叔本华和尼采学说。王国维在《宋元戏曲史》中将戏曲之起源归诸巫觋古优:“歌舞之兴,其始于古之巫乎?巫之兴也,盖在上古之世。”^①又云:“时则灵之为职,或偃蹇以象神,或婆娑以乐神,盖后世戏剧之萌芽,已有存焉者矣。”^②王国维未称戏曲而言戏剧,是因为他所认为的“合言语、动作、歌唱以演一故事”的“戏曲”是宋元才形成的,因此探究其起源时就用了义界比较宽泛的“戏剧”。王国维杂举《国语·楚语》、《说文解字》、《尚书·商书》、

① 王国维《宋元戏曲史》“上古至五代之戏剧”部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2页。

② 同上,第3页。

《汉书·地理志》、《诗经·国风·陈风》、郑玄《诗谱》等以证其说。但是,上述文献均未言及巫之与歌舞与戏剧的关系,把这层关系揭巢出来,是得益于西方学术给予王国维的滋养,具体地说,是尼采、叔本华的影响。在评价王国维学术取向时,有学者称:“总的看,在伦理学上,王氏舍尼而取康叔;而在诗学上,则有兼采尼说之意,但亦给予改造。”^①这是符合情实的议论。尼采文学批评名著《悲剧的诞生》即是将酒神祭祀作为古希腊悲剧的源头的,王国维于尼采哲学浸濡极深,于西方哲学确有较为广泛的了解,^②其戏剧起源的观念可以说渊源有自的。

同样的,刘师培《舞法起于祀神考》等也将舞蹈归源于巫覡,称:“疑巫字从舞得形,即从舞得义,故巫字并象舞形盖古代之舞,以乐舞为最先,……则掌乐之官即降神之官也。……乐舞之用,虽曰宣导其民,实则仍以降神为主也。”^③其间于舞法源于降神之乐舞的脉络梳理得极为清晰。刘氏又有《原戏》一文,亦将戏曲之歌舞,推源于古代祭祀之歌舞,云:“盖以歌舞节,复以舞节音,犹之今日戏曲以乐器与歌者舞者相应也。”^④其《论文杂记》云:“上古之时,先有语言,后有文字。有声音,然后有点画;有谣谚,然后有诗歌。”^⑤刘师培不懂外文,但是他青年时即对严复《天演论》等非常熟悉,^⑥他的著述中于西方学术引述最多的也是日本学者或者由日文转译的著作,^⑦其中大部分是 18、

① 参见佛雏《王国维诗学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 年版,第 316 页。

② 参见佛雏著《王国维哲学译稿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 年版。

③ 见刘梦溪主编《中国现代学术经典·黄侃、刘师培卷》,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 年版,第 786 页。

④ 同上书,第 793 页。

⑤ 见陈引驰编校《刘师培中古文学论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77 年版,第 227 页。

⑥ 见万仕国编著《刘师培年谱》,刘师培 22 岁时做的《读天演论》(二首),发表于《政艺通报》乙巳年第 1 号,广陵书社,2003 年版,第 75 页。

⑦ 参见李帆《刘师培与中西学术:以其中西交融之学与学术史研究为核心》,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 年版,第 83—88 页;及《刘师培、严复吸纳西学之比较》,收入氏著《古今中西交汇处的近代学术》,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 年版,第 161—172 页。

19 世纪西方社会学著作。

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第一章《史家对于小说之著录》中,对《汉书·艺文志》以下中国古代小说著录的情况做了细致的梳理,但第二章即转向“神话与传说”,他说:“(小说)则亦犹他民族然,在于神话与传说。”^①中国古小说既不是必然通向现代小说,而现代小说观念为一舶来品,则以此为基础的语源学研究和目录学研究势必均有方凿圆枘之病,而彼此扞格,鲁迅自己也认识到了这一点,其言:“史家成见,自汉迄今盖略同;目录亦史之支流,固难有超其分际者矣。”^②但他仍然将神话传说作为小说之起源,这样的观念也是西方学术的观念,具体地说是人类学的观念。

同为章太炎弟子的朱希祖,以史学名家而对文学独有偏嗜,他在《文学论》一文中把文学分为“外事”(或称外形,即艺术之谓也)、“内事”(或称内容,即思想之谓也),关于文学之内容的研究,朱希祖列举了美学、论理学、伦理学、史学、心理学等 16 种学科,其中人类学、人种学也在其列,他说:“上列诸科学哲学,求之吾国古书中,未始无其萌芽,然既无系统条理之言,即难臻广大精微之域。”^③

周作人在《欧洲文学史》摒弃“譬喻历史神话言语学诸派”而用“十九世纪后半,英人 Andrew Lang(安特路朗)氏创人类学解释法”解析希腊文学,^④取舍之间,可以见出周氏人类学的素养。其《中国新文学的源流》关于“文学的起源”的论述,也是由印度和希腊诸国,与中国文学相比较,而归于宗教祭祀。周作人是北大歌谣研究会的创始者,热心介绍弗雷泽、安特路朗等的理论,鼓励江绍原等进行民俗宗教研究,在人类学的推广和运用上,厥功颇伟。他在《我的杂学》一

① 鲁迅:《中国小说史略》,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 年版,第 6 页。

② 同上书,第 5 页。

③ 原载《北京大学月刊》第 1 卷,第 1 号,1919 年;今据《朱希祖文存》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 年版,第 48—49 页。

④ 周作人:《欧洲文学史》,商务印书馆,1918 年初版,今据岳麓书社 2010 年版,第 3—4 页。